

中国历史学40年

(1978—2018)

张海鹏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历史学40年

(1978—2018)

张海鹏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学 40 年：1978 - 2018 / 张海鹏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12

ISBN 978 - 7 - 5203 - 3670 - 3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史学—研究—中国—1978 - 2018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143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吴丽平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35.75
字数 565 千字
定价 2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四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成就述评	张海鹏 (1)
新中国考古发现及其对认识中国上古历史的贡献	陈星灿 (19)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符 奎 卜宪群 (30)
新世纪以来的民国史研究概况	汪朝光 (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四十年	张星星 (64)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进展	陈启能 (100)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徐 蓝 (115)
中国地方史、区域史、民族史研究	郝时远 (137)
四十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厉 声 冯建勇 (166)
四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华林甫 孙景超 赵逸才 (198)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李伯重 (219)
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	赵梅春 (242)
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 (1986—2018)	熊月之 张 生 (27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史研究概述	姜 生 韩吉绍 (299)
四十年来的中国环境史及医疗史研究	杜丽红 (325)
中国灾害史研究四十年	朱 浒 (353)
四十年来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	马陵合 (376)
四十年来的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	吴景平 (393)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李育民 (412)
1986 年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评述	王先明 (442)
四十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左玉河 (473)

2 中国历史学 40 年(1978—2018)

近二十年来的唯物史观研究	王也扬 赵庆云	(517)
四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理论问题综述	赵庆云	(530)
修一部信史和良史		
——清史纂修工程简述	马大正	(551)
作者简介		(564)
后记		(566)

四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成就评述

张海鹏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历史学走出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史学危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历史学领域是“四人帮”极“左”思潮的重灾区。所谓“儒法斗争”贯穿中国历史，所谓“对资产阶级要立足于批”，批判所谓“叛徒哲学”等谬论，肆虐于史学领域，显然是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教条化理解和标签化运用。加上那时提倡的“儒法斗争”“评法批儒”实际上是“四人帮”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不仅引起了人民群众对现实的普遍不满，也引起了知识界、史学界对影射史学的反感。这时候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史学界对于教条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唯物史观的反思，对于史学领域一系列错误观点的拨乱反正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2015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 22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基于这一认识，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谈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系统性、专业性时，把历史放在各个学科的第一位；谈到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把历史放到第二位，仅次于哲学。习总书记对历史科学这样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历史学发展的综合评价

40 年来，中国历史学各个领域，无论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

国现代史、中共党史还是世界史研究，都呈现繁花似锦的局面。这个时期，各个领域都有代表性著作问世。近些年来，我国历史学的代表性著作，以中国通史而论，有范文澜、蔡美彪等主编的《中国通史》十卷，有郭沫若主编并由编写组完成的《中国史稿》七卷，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十二卷，林甘泉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九卷，龚书铎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八卷，郑师渠总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十卷等；中国近代史方面，有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刘大年主持的《中国近代史稿》三册，李新、陈铁健总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十二卷，龚育之、金冲及等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五卷，李新总主编《中华民国史》十二卷，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十卷；中国现代史有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五卷；中共党史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两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三卷等；世界史方面，有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通史》六卷，武寅主持的《世界历史》八卷 39 册，还有陈之骅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何芳川等主编的《非洲通史》三卷，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十三卷，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美国通史》六卷，等等，都是我国历史学的积极成果。

至于各领域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不胜枚举。举凡政治、对外关系、法律、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民族、社会、历史地理、生态环境、灾害与救灾等领域，都有论著发表或者出版。仅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平均有数千篇论文发表，百种以上专著问世。这些学术专著，都是在近代以来史学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更不要说 1949 年前的史学出版物了。正是这些学术论著，烘托了 40 年来我国历史学各领域的繁荣。

我国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样一种空前规模的社会改造，也影响着历史学者们的眼界和观察历史的方法。社会历史是十分丰富复杂的，今天的社会现实也是十分丰富复杂的。以往的历史研究，突出了革命史、政治史，是时代的需要。但是，如果写历史只写革命史、政治史，就会蒙蔽人们的眼睛，限制人们认识历史的丰富内容。研究文化

史、社會史、經濟史、思想史、中外關係史、民族史、邊疆史，與研究政治史、革命史，同等重要不可偏廢。歷史研究以政治外交、經濟的歷史為主幹，可以帶動文化史、社會史、思想史、民族史、邊疆史的研究。政治史、革命史的研究也要克服簡單化的毛病，在全面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深化認識。40年來，有關文化史、社會史、經濟史、思想史、中外關係史、民族史、邊疆歷史以及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等方面，甚至人口史、災荒史等都有了很大的進展。這對於我們深化對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认识，是極其重要的。

隨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迅猛發展，國家的經濟實力增強，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都從中受益。國家開辦了社會科學基金，基金總額逐年擴大，歷史學各學科每年都有數以百計的項目獲得通過。單就歷史學來說，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支持歷史學學術發展的重大工程。如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國文明探源工程、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邊疆研究工程、抗戰研究專項工程，等等。這些支持工程的啟動，對於歷史學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的重大進展

中國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又是唯一一個文明發展未曾中斷的國家。從《史記》開始，堯舜禹就被作為傳聞時代。公元前841年以前的歷史，文獻不足。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考古發掘成功，史學界確認了夏朝的存在。這是史學界的重要成果。文獻記載上的夏朝被考古學研究證實，這是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進展。1985年夏鼐出版《中國文明的起源》，標志着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正式進入了歷史學者的視野。

大規模現代化建設帶動了大規模的考古工作。都城考古，文化遺址考古，古墓考古，都取得了極其豐碩的成果；甲骨文、金文、簡帛資料的大量發現，吐魯番、敦煌文書以及徽州文書等史料的發現，都在推動着中國歷史學研究的深入，不僅大大地改變了我們對《史記》等古代記載提供的中國上古史的知识，也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戰國直到魏晉乃至宋元明清歷史

的知识，加深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学者们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做了大量深入的实证研究，通过这些实证研究，在古代中国的历史的认识上有了许多前进。如有关人类起源问题、有关中国农业起源问题、有关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问题等。

关于人类的起源，自 1871 年达尔文发表《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以来，关于人类起源和起源地问题各执一词，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特别是中非的肯尼亚。中国考古学的成就证明，现代人单一起源的说法得不到中国考古学的支持。中国考古学家已发掘的几个点：如重庆巫山人距今约 200 万年，云南元谋人距今约 170 万年，北京人距今约 70 万—20 万年，至少可以证明，人类起源不一定是单一起源，应该是多源的。

关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研究了大量古代遗址中的植物遗迹后，已经得出大体接近的认识：1 万年前，中国的栽培稻出现；8000—9000 年前稻作农业形成；距今 6000—7000 年前，稻作开始在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普及，稻作农业经济的代表遗址在距今 6000 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距今 7500—8000 年的遗存中，粟、黍已在华北广泛栽培了，距今 6000—7000 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华北旱作农业建立。考古资料证明，我国极有可能是世界上粟、稻、黍等几种主要农作物的起源地，至少是起源地之一。这一认识也有别于欧洲学者中国农产品西来说的早期认识，也推进中国学者此前的认识。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20 世纪中叶以前，欧美学者坚持中国文明西来说，赞成者众多。在突破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夷夏东西说以后，中原中心论曾经是学术界的主流认识。我们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到底怎样？随着 20 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考古发掘提供的大量实物资料，中国学者开始依据地下发掘的实物资料并结合历史文献，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30 年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以及据此展开的学术研究，使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进程在国内学术界得到相当程度的共识。黄河流域以外多个地区，包括长江流域、辽河流域、鄱阳湖流域以及珠江流域考古发掘的丰富材料，促使史学界认识到，原来，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是多元的，是繁星点点、满天星斗。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多元逐渐走向“一体”。各个地区的文化相互竞争、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中原地区

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二里头二期遗址表明所谓“一体”的形成。夏代晚期城址的发现，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说明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工具——国家出现了。文明已经走到历史的大门口。同时，“一体”与多元也在相互促进，在多元发展中有所发展。“多元起源，中原核心，一体结构”，^①这是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对于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形态的共识。这个共识很重要，它填补了古文献的缺失和不足，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文献的相互参证，今天的中国人对夏商时期的认识较前深刻多了，再不是传说时代，而是切切实实的历史存在。我们对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的自信大大增强了。

在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讨论中，国内学者以往根据恩格斯的理论，认为中国也经历了部落联盟转变为国家的模式。20世纪80年代引进国外有关“酋邦”的理论后，对上述见解产生了质疑。林甘泉研究了中国古文献以后，认为中国前国家时期的政治组织是酋邦而否定有部落联盟，这一观点还缺乏足够的根据。^②

如何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进行分期，一向是中国历史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以上古、中古、近古的概念来分期，中国古已有之，这种分法失之笼统，难以显示历史发展的实质。许多历史学家都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为中国历史分期的理论根据。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考察中国历史问题，近些年来有各种讨论和质疑，聚讼纷纭。林甘泉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有关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演变，认为斯大林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这种表达方式。斯大林的表达简明扼要，但容易产生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毛病，但如果据此认为五种生产方式是斯大林制造出来的公式，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真实。林甘泉认为，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用社会经济形态来划分历史的不同阶段，能够比较全面而深刻地解释不同时代的本质特征。他指出：“主张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指导来划分历史

^① 林甘泉：《世纪之交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林甘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9页。

^② 同上书，第413—414页。

发展阶段，揭示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并不意味着要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剪裁成社会发展史的公式。”^①

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主张存在奴隶社会，但是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出质疑和挑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我们主张在仔细研究历史文献和考古实物资料的基础上，继续展开讨论。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所谓奴隶，主要是家内奴隶，与希腊、罗马那样的生产奴隶还是有区别的。中国存在着长期的封建社会，一向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基本看法。近年来也有不同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早期历史文献中有“封邦建国”的记载，那才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它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不同的，中国历史不要套用封建社会的名称。其实，中国历史上封邦建国的“封建”只是当时一种政治制度，多数学者主张的封建制度或者封建社会，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指封建的生产方式，是指领主制或地主制那样的生产关系。封建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翻译成汉语时借用了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封建”二字。如果只认为封邦建国的“封建”才是“封建”，中国历史就回到陈旧的解释窠臼里了。

为了推动对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联系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方面学者攻关，对中国文明史初期的年代学大体已得出共识：夏的年代在公元前 2070 年至公元前 1600 年，这是在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为了团结全国以及国外的研究力量，深入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河南省、山西省等地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2002 年春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正式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并且被列入“十五”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该项目将研究的地域范围放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时间范围定在距今 4500 年至 3600 年，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到夏代末年。这项研究将为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基础，摸索经验，并提

^① 林甘泉：《世纪之交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林甘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21 页。

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

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国家组织了清史纂修工程，推动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历史的研究，以著名的清史专家戴逸教授担任总主编，组织一千数百位清史学者，以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创造性地继承中国修史传统，开展全面的清史研究。不过十余年时间，清史主体工程大约100卷3000万字的文稿撰写已经结束。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认识

中国近代史，与中国古代史学科相比，它是在20世纪初产生、20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与西方列强猛烈冲撞的历史，也是中国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历史。换句话说，是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探索中国独立、救亡和富强道路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人在不同时期从欧洲学来了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也学来了马克思主义，用这些学说和主义做理论武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最终赢得了民族的独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20年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学科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范围做过长时间的学术讨论。40年前，中国学术界大多把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最近20年，许多学者认为这样的分期是不科学的。因为，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1840—1949年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一个社会形态分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是不妥当的。学术界的基本认识是：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的近代史，也即是以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1997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著名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胡绳先生明确提出：“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

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①我本人也多次在报刊发表论文和文章，阐明胡绳先生的建议。^②现在这一认识，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共识，几乎无人质疑。

变化来自《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编撰和出版。这本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批重点教材经过中央批准，已经进入全国大学生的政治理论课课堂。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③这句话极其重要，它定义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学科范围。这说明，中国近现代史学界长期讨论，并已取得基本共识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学科对象问题，已经固定下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正式公布了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1年通过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编写的各学科概况、内涵、范围和培养目标。这个一级学科简介里，中国史的学科范围明确规定了7个学科方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专门史、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这里，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1949年起的中国现代史，已经在高校学科方向和人才培养中明确起来。

明确中国近代史的学科概念，是一种学术进步。在这个概念下，中国近代史包括了晚清历史和全部民国历史。学者可以从长达110年的长时段来观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便于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及其变化规律。

近代中国长期处在内外战争环境中，革命势力的成长、革命事业的开展，成为这段历史的基调。学者们以往在处理近代中国的历史时，往往强

① 胡绳题词，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100期纪念号）。

② 见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光明日报》（史林版）1998年2月3日；又见《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③ 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开篇的话”，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调了革命史，对于历史的丰富内容则照顾不够。最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做了许多探讨。有的学者提出了现代化范式的概念，主张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用所谓现代化范式代替所谓革命史范式。在近代中国，革命是那个时候社会的基调，革命的目的是谋求国家的独立和富强。独立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富强就是要现代化。但是近代中国 110 年历史，现代化未能成为时代的基调。还有一种意见，提出现代化史观和革命史史观的区别。学者认为，对于这种区别，不要简单地采取否定或者肯定的态度，应该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的过程，既要看到革命史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基本作用，也要看到现代化进程在近代中国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主张，革命和现代化都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总之，采用现代化视角观察近代中国历史是可取的，代替说并不合适，研究和叙述历史不能简单化。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讨论中，有关近代中国发展演变的规律引起学者的关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经历了屈辱的历史。这就是历史的“沉沦”。到 1901 年签订《辛丑条约》，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社会开始走出“谷底”，走出“深渊”，迈出了“上升”的步伐。这时，中国社会的主要标志不是屈辱，而是奋斗，是艰苦卓绝的奋斗。在奋斗中，赢得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 年后，中国迈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开始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今天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社会的主要标志是光荣。1949 年，成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

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体学习了抗战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抗战历史发表了重要讲话。总书记强调研究抗战历史，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八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 14 年抗战的历史，14 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这个讲话给中国近代史学者极大的鼓舞。为此，国家安排了抗战研究专项工程，支持抗战历史研究。作为成果之一，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已经上线，预计到 2018 年年底，上线文献

总量将达到 1300 万页，引起研究抗战史的国内外学者们普遍关注。

世界史研究的创新思考

40 年来，世界史研究成绩显著。总体来讲，我国的世界史学者面对庞大的研究对象，仅有不多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从事研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2011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学科调整目录，世界史学科从二级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这对于高校世界史教学将带来推动力量。再过 10 年，我国世界史教学和科研人员数目将会有大幅提升。

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是后起的，1949 年以前，中国的历史学界还谈不上世界史的研究。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世界史研究才逐渐兴盛起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经历了先介绍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再独立进行研究的过 程。中国学者用中国人的眼光观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对世界历史研究中的“西欧中心论”保持着质疑的态度，并且一直在探讨中国学者主张的世界史理论体系。武汉大学历史系吴于廑教授对世界史学科的对象、范围、主题、途径、主线和研究方法提出一系列看法，他认为：世界历史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孤立发展的，只是经历了 15、16 世纪以来的一系列重大转折之后，才形成整体的世界史。吴于廑先生在他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条目中指出，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①这个看法的核心是如何从全局上说明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可以把它称为整体世界史观。这种世界史理论体系，希望突破西欧中心论，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荣渠提出了以现代化的

^① 吴于廑：“世界历史”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15 页。

世界进程作为世界历史理论体系和架构的观点，并且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主张：“新的现代化理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为纲，从经济史入手，加强对原始积累、商业资本、工业资本一直到垄断资本的更深入的全面研究。”^① 这一理论模式，对中国世界史学界有相当影响。是否以现代化作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新体系的主体，学者间一直存在争论。最新的争论出现在最近出版的《历史研究》杂志上。这期杂志上有学者坚定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②，也有学者反对这一主张，认为“不应该抛弃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主线另起炉灶”。^③ 还有学者坚持整个社会形态的交替构成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的线索，认为“没有一种其他的历史理论和学说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更加关注人类整体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变化的阐述所具有的系统性和完备性是何种已知的其他理论无法相比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在构建世界历史体系的工作中也应该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④

在世界史研究和撰写体系中，突破西欧中心论，是否意味着世界历史就是各国历史的总和呢？有的世界史学者认为，我国编写的各种世界史教材（包括通史和各种断代史），都是按照社会发展形态进行历史分期，逐一叙述各地区、各国和各民族的历史。这实际上是一种分阶段的各国历史汇编。学者认为，这样一种历史叙述方式不能总揽世界全局，不能从全局考察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不可能成为反映客观历史过程的科学著作。我国学术界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态度，努力构建中国的世界史体系，有鉴别地吸取当代国际史学及社会科学一切新理论和新方法，考察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整体轨迹，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发展。由此，有的学者提出了“全球史观”这样的概念，认为“全球史观”这样的概念可以避免用国别史范畴的概念去说明世界史的运行特点和规律的弊

① 罗荣渠：《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编《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世界史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② 钱乘旦：《现代化与中国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③ 李世安：《现代化能否作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新体系的主线》，《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④ 俞金尧：《什么是“世界历史”及如何构建世界史体系》，《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病，更加科学地发现和说明整个世界的发展状况及发展规律。

近年来，我国世界史学者就全球化和全球史，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史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新体系。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史观不是不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也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史观的影响力有限，尽管全球化史观已经问世近半个世纪，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基本上还是建立在“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解读之上。还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史观还存在诸多理论缺陷，最明显的是忽视社会内部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就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①

在我看来，在讨论世界史体系、质疑“西欧中心论”的时候，不能犯简单化的毛病。已经有学者指出，“西方中心论”是否成立，并不取决于主张这种理论逻辑的研究者是否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而是取决于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中是否发生过西方作为支配性的力量崛起于世界的历史事实。客观来看，从曾经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说，在 15 世纪以前，世界历史上不止存在过一个中心。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以后，世界历史的中心变成以西欧为主。无论是向世界各地传播资本主义，还是向世界各地同时传播殖民主义，欧洲都曾经严重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但是世界历史的中心也不止一个。在很长的时期里，东方社会以中国为代表也还是一个中心。当然这个中心在 19 世纪中叶起，其地位慢慢削弱以至于消灭。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兴起，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逐渐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就有苏联一个中心，资本主义阵营有美国一个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难道不是世界历史上的多中心吗？我们不能否认，在一段时间里，在欧洲发动战争的德国是一个中心，在亚洲发动战争的日本也是一个中心。历史进程还在发展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殖民主义及民族独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世界历史的中心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的美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中心，但是不能说今天的世界只有一个中心。世界历史的推进从来都是在不止一个中心存在情况下，两个或者

^① 参考于沛主编《全球化与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